

转眼间,我的公公(石门方言称祖父为公公)——丰子恺先生溘然长逝已经整整五十年了。五十年光阴的沉淀,让我觉得公公的身影越来越远去。于是,我愈加珍视那些童年记忆的偶尔浮现,每次都仿佛是和公公难得的重逢。在他五十年忌日到来之际,我忍不住提笔,记下当年一堂难忘的“美术课”,再次重回到公公身边。

我小时候最爱小学图画课,更喜欢老师让我们自由发挥的时候,我可以随心所欲地任意挥洒。在我八九岁时,我画了一幅风景画:一匹白色的高头大马站在宽阔的绿色草原中间,远处的天边,红色的太阳正冉冉升起。尽管画面简单,但色彩鲜艳,很有表现力。我得意地拿到日月楼给公公看,满以为他会夸奖我几句。不料,公公看了片刻后对我说:“马的位置不对。”见我一脸迷茫,他耐心地解释道:“一幅好画,中心人物不应放在画的正中间,也不宜挤在边上,而是要放在大约三分之一的位置,这叫作黄金构图法。你的大马在画的中间,应该移开一些。”我依然不解:“为什么三分之一?”公公笑了笑,回答道:“这就是人的感觉,你不妨重新画一张试试看。”于是,我重新画了一幅,将那匹大马移到画面约三分之一的位置。我将两幅画并排贴在日月楼的墙上,后退几步观赏,确实觉得第二幅画更有美感。于是我问公

公:“为什么呢?”公公微笑着说:“整幅画需要给人一种平衡感。如果那匹大马改成一匹小马,和图里的太阳差不多大,那么放得再靠边些也无妨。”他还提到,照相构图与绘画构图有异曲同工之妙,黄金构图法是基本原则。我听得入神,追问公公构图还有哪些诀窍,他强调道:“构图时要避免呆板,比如画三个苹果,如果它们间隔均匀并列,像军人排队,画面就会很单调难看,要错开一些才有味道。如果苹果有大有小,你想象它们象征着一家大小在说话来摆设,画面便会更有趣味。”最后公公关照我,画画的关键是立意,构图是技巧,切不可刻意模仿他人的作品,成为一架印刷机。一幅简单的自由画,竟成了一堂难忘的美术课。

古人云:“人有两次死亡:一次是肉体生命的终结,另一次是名字被世人遗忘。”五十年前的九月十五日,公公与世长辞,第一次与我们诀别。然而,他并没有被遗忘,这些年来,关于公公的纪念和研究从未间断。就说最近几年,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出版了我与姐姐夫南颖合著的《回忆祖父丰子恺——长乐邨的往事》;法国出版了法国艺术史专家柯孟德与法国汉学家尹文英合著的《丰子恺:从黑白到彩色》。公公留下的饱含人生智慧与生活情趣的文学与艺术,拥有穿越时空的魅力,超越国界,传遍四方。

羽还想多看看上海的变化。我随刘白羽两次上“东方明珠”观光,参观上海大剧院、上海博物馆等,还陪他到上海老城厢去寻访1946年夏天他住过的旧居。刘白羽回忆道,当年南方局来电,要他到上海新华日报等各处工作。他即从延安带上在窑洞完成的《环行东北》初稿一路辗转来到上海,被安排到地下联络点。他在嘈杂的环境工作,暑夜不顾蚊子叮咬,挥汗修改《环行东北》。15万字的《环行东北》很快通过秘密渠道出版,影响很大。一次,刘白羽在郭沫若家见此书,他把这次“巧遇”戏称是新书的“首发式”。

14日,刘白羽来到浦东国际会议中心亚洲厅。进门后,他朝玻璃幕墙走去。指着对面的上海大厦说:“解放初,我在‘百老汇’14楼住过。”接着又说,他随“四野”征战到汉口,这时,武汉军管会副主任陶铸对他说,“武汉刚解放,须尽快与上海通航,你人头熟,能否去了解一下情况,供我们参考?”刘白羽听到是去上海,可高兴了。一到上海,军管会

春城无处不飞花

2001年3月22日,刘白羽回到首都301医院才几天,给我寄来了“春城无处不飞花”墨迹。从诗中我看出他的心还在上海。

3月9日,刘白羽到上海后,赶往华东医院。他见巴老说话困难,便握着巴老的手说:“再过几个月我们相知相交六十五年了,是值得纪念的。”病卧在床的巴老微微点头。刘白羽那次在沪十天,“三顾”巴老病房看望……1934年,还是文学青年的刘白羽,经靳以介绍与巴金相识,当听到巴金要给他出书,毫无准备。这时,巴金把整理好的文章放在他面前说:“这是你的文章,编个集子够了。”就这样,刘白羽的第一本小说集《草原上》在上海诞生了。难怪刘白羽对巴老有种很深的感恩情结。

3月9日那天,刘白羽还看望了杜宣,在病房,杜宣拿出散文集《桂叶草堂漫笔》及《杜宣剧作》相赠。刘白羽无意间在书上看到1984年5月杜宣随巴老出席东京47届国际笔会的片段,这成了他俩的共同话题。我听他们交谈,当年作为工作人员的我去机场迎接的情形恍如昨日,副团长刘白羽给我留下印象是高挑的身材,身穿灰哗叽呢大衣,手提公文包,简洁的装束有股子军人的英气。刘白羽把在上海的活动表排得满满的,他走访了老战友陈沂、马楠夫妇。11日傍晚,他突然叫我把张瑞芳、周小燕接到他下榻的衡山宾馆。刘白羽只能采用临时“加场”的办法与朋友相聚了。刘白



喧闹而快活的波尔图

徐静波

从西班牙进入葡萄牙的时候,完全没有出入境的感觉,我们坐在巴士上也不用下来。先去了布拉加,然后南下进入了葡萄牙第二大城市波尔图。粗粗的感觉,葡萄牙的街市似乎不如西班牙那么整洁干净。在市中心的酒店入住后,晚上八点多,出外去觅食,穿过两条小巷,街上有点冷清。来到了一家餐馆,走到最里边,是一个有玻璃天棚的半开放式的大餐厅,四个人分享,小杯的生啤,每杯2.7欧元,大盘的特色色拉,18.5欧元,牛排配煎鸡蛋和薯片,23欧元,感觉这里与西班牙也没什么差别。

翌日在酒店里用过早餐后,大概八点多,外出闲逛,酒店的斜对面,就是一座折中主义风格的大厦,据说是市政厅,上有耸立的钟楼,在南面的长方形水池中投下了清晰的倒影。一路走过去,稍有古风建筑,几乎都在修缮,有两座巴洛克风格的建筑,内部几乎已被挖空,只留了梁柱和外面的一堵墙,搭了脚手架,还有高高的塔吊,感觉有点杂乱。此时街上冷冷清清,人迹稀少,不料九点三刻再出门时,街上已经开始乌央乌央的了。青花瓷砖铺贴的墙面,顿然使欧式的建筑焕发出了异样的光彩。青花瓷应该与16世纪大航海时代以后与中国的贸易有关,但实际上更多的是来自阿拉伯人的影响。青花瓷的艺术,在圣本托火车站内,达到了另一个高潮,车站的大厅,简直成了青花瓷艺术的博物馆。中午在一家麦当劳店,几个人买了超大的汉堡、几份薯条和大杯的生啤,闲闲地坐在门口搭有遮阳棚的街沿上,浏览着街上熙来攘往的各色观光客,人在风景里,风景被摄入了人的双眸中。下午又在往南的、坡度明显的街巷中闲走,见到一群身穿黑色裙装、白衬衫上系着黑领

带的女青年,弹着吉他和尤克里里,有节奏地击打着鼓面,摆摆身体在欢乐地吟唱什么歌曲,在为一个慈善项目募款。有一男子在街边出售波尔图的钢笔风景画,当场对着风景照片在描摹,买了一幅大的,20欧元,是杜罗河北岸的风景。

再往南,从铺着卵石斜坡走到下面,水色青碧的杜罗河就映入了眼帘。河的北岸,色彩斑斓的房屋重重叠叠,彩色钢笔画描摹的景象,就是这一带。人们或坐在咖啡座上闲聊、观风景,或在河边走动拍照,抬首,东侧的河上,一座底下由拱形铁架支撑的高高的铁架桥巍然出现在眼前,这是设计了埃菲尔铁塔的埃菲尔的弟子塞林格设计的,1886年建成,已列入世界遗产,坐轨道缆车到山上,走到桥上眺望两岸的景色,真是如诗如画,尤其是东面,正沐浴着斜阳的金色光辉,山峦的岩石肌理,和山下房屋橘红色的屋顶、白色或浅蓝的墙面,在夕阳下都闪耀着一种透亮。杜罗河南岸,当地社区有好几支鼓乐队,也不知是在庆祝什么,男男女女,穿着或天蓝或橘黄的上身制服和白色的长裤,个个兴高采烈,鼓乐的水准也不坏,一路游行,聒噪的声响引来了无数路人的观看,喧嚷喧闹,却井然有序,空气中都溢满了快活的负离子。



丰子恺 (版画) 周全友

交际处长周而复安排他住上海大厦,并受邀到顶层俯瞰“夜上海”。他从璀璨的灯火中看到新上海的曙光……所以,刘白羽借用唐代诗人韩翃的“春城无处不飞花”来赞美上海也在情理之中了。

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后,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,1949年7月6日下午3点,为纪念“七七”抗战十二周年,庆祝上海获得新生,上海在北四川路(现四川北路)举行了规模盛大的阅兵和胜利大游行,对进城的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检阅。当天许多市民观看了阅兵,母亲便是其中的一员。

母亲当时在北四川路山阴路附近的一所小学担任教员。学校校长得知要举行阅兵和庆祝胜利

大游行,决定在7月6日放假一天,让大家观看阅兵和参加游行。母亲在回忆那天阅兵盛况时曾说,当天自己和学校里的许多教员吃过午饭后,便相约早早地来到北四川路江湾路口阅兵现场,等候观看阅兵式。那天北四川路从虹口公园(现鲁迅公园)到溧阳路一带的街头挤满了人,大家都翘

们的性命。你把日军在缅甸的重要据点、驻军人马、兵力分布,以及部署情况写给我,我们

从上海到缅甸的传奇

杨克林

会通知美军飞机不要去轰炸。他起初一直怀疑,但最后终于写了,签了他的名字:辻政信大佐。当天晚上印缅战区司令索尔登将军打电话给王宇钦,说:“王,你的东西我看到了,这时候你的情报比什么宝贝都要好,在破解日军的军力和部署等情况下,我们可以很快地结束缅甸战事,并会减少许多牺

几年前翻译过希拉里·曼特尔的一个短篇小说《刺杀撒切尔夫人》,印象最深的是对其中的短语 get a shot 的处理。那故事里的“我”,住在英国温莎,从卧室窗口能看到温莎医院的花园。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正巧在那家医院里做一个眼科手术,如果想看到她出现在花园里的样子,那么,“在我的卧室取景得天独厚”(My bedroom had a perfect view of the hospital garden)。

杀手来自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,冒用水暖工的身份闯进民宅寻找射击点,他包里的“金属配件”组装起来就是一把枪,枪的绰号叫“寡妇制造者”;而“我”所处的社会阶层、接受的教育程度显然高于前者。“我”倒是一眼就看出此人并不是来修水管的,但旋即将他误会成了摄影记者,因为此人一开口就说了一个具有双关意味的句子:“It’s a great place to get a shot.”这个 shot,杀手当然意在“射击”,但 shoot 这个词及其时态变形,同样可以理解成摄影——“我”按照更寻常的逻辑自然会往后者方向考虑。所以在这句话之后,两人之间又阴差阳错地双向误解了好一阵。问题是,在中文里,射击就是射击,摄影就是摄影,并不存在将“射击”与“摄影”的含义合而为一的双关词。为了在译文中达到“功能对等”,我在反复推敲之后将这句台词翻译成:“在这里抓个角度再好不过。”

这样一来,对话的两边,都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大体完成这个“双关”的表达与接收——尽管在中文里,这样的修辞并非浑然天成,因而语气的强度会有所减弱。因有这一番字斟句酌的过程,所以我对于 shoot 在这篇小说里的作用,乃至镜头与枪口之间那种既直观严峻又饱含隐喻的关系,都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。以至于,当我在2025年的电影院里看到《南京照相馆》的时候,心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,申奥导演“抓到了一个好角度”。

如何在一段复杂而悲怆的历史中构建一个好故事,如何将千头万绪的线索归拢在一起,如何在意象的洪流中打捞出最简洁也最有冲击力的那一个——《南京照相馆》可以算是个相当聪明的案例。影像之于历史,历史之于记忆,记忆之于民族与个体的意志和凝聚力,这些并不容易言说的话题,通过在镜头与枪口之间构建关系,获得了很高的叙事效率,从而成为整部电影的最直接也最强烈的戏眼。

导演没有浪费这个戏眼。从日本摄影师战战兢兢地接过日军长官扔来的枪,到结尾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毓秀用照相机对准战犯的死刑执行现场,镜头与枪口的强关联在这部电影里被多次冷静、克制且巧妙地表达。在一个小而深的切口中,编导演紧紧围绕题目做文章,自始至终也没松一口气。在日军试图伪装“亲善”的镜头逼视下,尚在襁褓中啼哭的婴儿被虐杀——那一刻,shoot 的两重性,“镜头即枪口”的叙事力度,都达到了最尖锐的顶峰。

隐藏得更深的一点好处是:因为有了这个“戏眼”统摄全局,全片的节奏张弛就有了内在的逻辑。当老金在那样逼仄的空间里有条不紊地讲述照相洗印的门道,指点相纸和镜框里的“大好河山”时,观众会看到他眼里倏然亮起的光,也会跟上叙述的脉络,自然进入故事的轨道。

首以盼,看看解放军的威武雄姿。

母亲回忆说,下午三点半左右,盛大的检阅典礼开始了,在一片热烈的掌声和雄壮的音乐声中,陈毅等率先与二十余位军政首长和百余名来宾登临检阅台。当第一辆军车在车头上用红纸写有“纪念七七、庆祝解放”,下款署“上海市军民联合大游行”,

后面的小型坦克上,分别竖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肖像通过时,检阅台上台下掌声雷动,受阅者和观看的群众情绪达到了高潮。

母亲说,自己是第一次看到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,非常地兴奋而好奇。“共产党的部队就是不一样,威武雄壮,纪律严明……”虽然那天下起了雨,但母亲和她的同事们兴致依然很高,冒雨观看了阅兵的全过程,直到天渐渐地暗下来,才离开北四川路回家。

这是我首次打了败仗,死伤七十多人……”王宇钦这才知道,父亲在宝山的那一场仗,日军伤亡七十余人。不过,王宇钦未曾告诉他,那一仗守卫在宝山的,正是他父亲带领的上海市民义勇军。这事当真是最惊奇的历史巧合。

现在,在上海宋园路宋庆龄公墓里面,仍能看到王宇钦父亲王屏南的墓和谢晋元的墓相邻相伴。(本组文章由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特约刊登)

十日谈 他们生出大量前线抗日交通运输急需的燃料。
80年:追忆、追问 责编:刘芳 沈月明